

戰時教育行政回憶

(下)

陳立夫

九、國民教育的推進

國民教育向為地方政府所主辦。在戰前各級教育之中，以國民教育為最落後，小學並未普及，學齡兒童就學率很低。國民政府進行黨綱中厲行普及教育之規定，曾經數次頒訂實施義務教育辦法，未見顯著成效。民國二十四年再訂實施義務教育暫行辦法大綱，令各省市自該年八月起施行，漸著成效。據統計民國二十五年的學齡兒童入學的比例，已由廿三年之二九·八二增至百分之五三。抗戰起後淪陷若干省市，國民教育所受打擊最大。我到部以後，一面令後方及敵後各省市繼續依實施義務教育暫行辦法大綱，推行義務教育；一面對國民教育作根本的改造和積極的推進，七年的努力，有顯著的成就。舉其榮榮大者：

有建立國民教育制度，訂頒推行國民教育計劃；督促並輔導各省市實施國民教育計劃，計年責其成效；使國民及中心國民學校之數增加，學齡

兒童入學比率逐年增大，文盲數逐年減少。現在就此數質，加以敘述。

國民教育制度係配合二十八年政府所頒布的「縣各級組織綱要」，即所謂「新縣制」而建立的。這新縣制中關於教育方面的規定，有下列要點：

- (1) 每鄉（鎮）設立中心學校，每保設立國民學校。
- (2) 鄉（鎮）中心學校與保國民學校均包括兒童、婦女、成人三部分，使失學民衆補習教育與義務教育打成一片。
- (3) 鄉（鎮）長，中心學校校長及壯丁隊長、保長、保國民學校校長及保壯丁隊長，均暫以一人兼任之。在教育經濟發達之區，鄉（鎮）中心學校校長，保國民學校校長以專任為原則。
- (4) 鄉（鎮）中心學校教員；兼任鄉（鎮）公所文化股主任及幹事，保國民學校教員兼

任保辦公處文化幹事。

上列各要點，與原有教育法令出入頗多。教育部依照各要點將前此推行之義務教育與失學民衆補習教育，合併實施，統稱曰國民教育。部中主管單位亦改稱國民教育司。原屬社會教育司主管之民衆補習教育，亦改歸國民教育司。並於二十九年三月訂頒「國民教育實施綱領」，令各省市試行，國民教育新制度，遂隨著新縣制而訂立。此項綱領試行三年以後，根據試行結果，對於新縣制中之規定酌有改變，使合於教育實際需要。為完成法律基礎起見，特草擬「國民教育法」以代替原有之「小學法」。「國民教育法」經立法院通過後，於三十三年公布，國民教育制度便成為法律，為其後實施國民教育之基本法。國民教育法，變更縣各級組織綱要中的規定的，有下列重要各點：

- (1) 確定中心學校名稱，改稱為中心國民學校。

(2) 保國民學校及鄉鎮中心國民學校，不限定設置一校。

(3) 私人或團體，亦得設立專辦國民學校兒童部之小學。

(4) 確定國民學校及中心國民學校均隸屬於縣政府及院轄市之主管教育行政機構。

(5) 確定國民學校及中心國民學校教職員應協助鄉鎮公所及保辦公處，訓練民衆，推行地方自治。

(6) 確定學齡兒童及失學民衆之強迫入學，另以法律定之。

以上各點規定，都較新縣制之規定，更合於教育需要。可是因為改變新縣制的有關教育規定，遭遇不少阻碍，我爲了克服阻碍，在行政院陳述，在中央黨部提案，並請國民參政會通過議案，最後經過立法院的決議，不知經過了多少說服工作，最後始完成法律而奠定了國民教育新制度。

制度建立，不能自行。我們還訂了實施計劃，督促各省市推行。在二十九年公布之「國民教育實施綱領」中，已訂有施行程序一章。在此一章中，規定國民之普及以五年爲期。自二十九年八月起至三十四年七月止，分三期進行。

第一期：自二十九年八月起至三十一年七月止爲第一期。在本期內各鎮（鄉）均應成立中心學校一所，至少每三保成立國民學校一所。在本期終了時，須使入學兒童達到學齡兒童總數百分之六十五以上；入學民衆總數，達到失學民衆總數百分之三十以上。

第二期：自三十一年八月起至三十三年七月止爲第二期。在本期內保國民學校應逐漸增加，或就原有之國民學校增加班級。在本期終了時，須使入學兒童達到學齡兒童總數百分之八十以上；入學民衆達到失學民衆總數百分之五十以上。

第三期：自三十三年八月起至三十九年七月止爲第三期，保國民學校數應盡量增加，以期達到每保一校爲目的，或就原有之國民學校增加班級。在本期終了時，須使入學兒童達到學齡兒童總數百分之九十以上，入學民衆達到失學民衆總數百分之六十以上。

上項分期普及國民教育計劃，經教育部飭令各省市參酌當地實況，加以實施。爲了實施的順利進行，教育部並訂定訓練師資及籌集經費辦法令各省市照辦。中央與省並補充縣鄉實施普及國民教育的經費。中央財政已因應付軍用，十分困難。可是我向中央竭力陳述國民教育的重要，所以能做到在中央教育預算中，列入普及國民教育的補助費。

國民教育經過中央的訂定計劃，並補助經費和隨時派員視導，分期推行的結果，已能逐漸接近原訂分期應達到的標準。茲以三十三學年度（即是實施的第四年）爲例。此年度實施國民教育的有後方十九省市。其鄉鎮數共爲二六、四一四。

其保數爲三〇三、七九二。已設國民學校（包括中心國民學校）共計二十五萬四千三百七十七所。平均各省市已超過每三保有二校之規定，距第三期終了後每保應有一校之規定，已經不遠。

再以學齡兒童的入學率而論：卅三年度後方十九省市共有學齡兒童三千四百一十一萬餘名。入

學兒童數計共有一千七百二十二萬餘名，連同已受義務教育而不在校之學齡兒童，合計學齡兒童已入學者約共有二千五百餘萬名。入學兒童總數約佔學齡兒童總數百分之七十強。比較戰前之百分之五十三，大有增進。在戰時各方人力物力維艱之時，能對於國家基礎教育加以推進而有此成績，我教育界實可以自慰。

關於國民教育的其他重要措施，尚有有關籌畫國教經費，訓練師資，及優待國民學校教員等各項法令的公佈；有各省市教育行政機關在實施國民教育時應行注意事項的訂頒。幼稚園規程，修正小學各科課程標準，小學訓育標準也先後訂頒。三十三年由國民政府公布的國民學校法，將戰時對於國民教育的創制，作法律的制定，也奠定了國民教育久遠的基礎。

十、社會教育的創新

社會教育，關涉多方面，比較爲不定型的教育，且當抗戰時期，人心士氣的振奮，敵愾同仇心理的激發，亦多賴社會教育助其宣傳與推動，所以戰時的社會教育很多創新的機會。此時回憶，有許多措施，值得記述的。

教育部原來直接主管的各社會教育機構爲與民族文化學術有關之國立圖書館與博物院，如中央圖書館、中央博物館、北平圖書館、故宮博物院。此等院館的文物和人員均於戰爭初起時，已向後方遷移。我到部以後，認爲這些都是國家民族學術文化命脈所寄，應妥爲安置。所以先後指定適當的地點，勘定館址，繼續開辦，其工在

籌備中者，並助其短期正式成立。此等院館雖然歷經播遷，所有圖書文物均無散佚，且有增添。如河南古物原屬地方，撥歸中央院館保存開放觀覽。如上海藏書家珍本圖書，經發鉅款派中央圖書館蔣復璁館長冒險開關前往搜購，加入收藏，以免敵僞攫取或毀壞，這於保存民族文化，都很有貢獻。此等圖書文物連同藏在海外珍本圖書，均克於大陸淪陷前完整遷移臺灣，使故宮博物院與中央圖書館先後復館完整無缺，為中國文化大放光明，戰時的保存和增加，種種努力，值得紀念。

除了恢復並發展原有國立院館而外，在戰時還創設了好些中央社教機構。三十一年籌設中央民衆教育館於重慶。三十二年籌設國立西北圖書館於蘭州。（後改稱國立蘭州圖書館。）三十三年由中英庚款董事會收辦國立甘肅科學教育館。三十二年成立國立禮樂館於重慶，同時復籌設中央美術館於陪都，國立敦煌研究所於甘肅。凡此館所，與原有遷移各館不同，都係憑空締造。初創之時，未免簡陋，但逐漸經營頗具規模。在懸格過高者看來，未免因陋就簡，但我的政策是「先求其有，再求其好。」由無而有，由有而好，乃是一切事業發展的途徑。如懸格過高，先不能有，那可能好？尤其在戰時一切物人力力維艱，如只求好，則將一事不能與辦。我主持教育行政，不僅對於社教機構的創辦，取由有而求好的政策，對於其他教育事業，也莫不如此。戰時教育不僅未萎縮，且有蓬勃氣象，莫非由於採取這個政策。

除上述各館外，教育部為適應需要，還直接舉辦了其他多種社會教育工作。戰區社會教育人員流離失業，教育部舉辦登記，先後共達一千八百餘人，組成兩社教工作團，派赴後方各省市從事抗敵宣傳及社教工作。二十九年改為正式任用，化救濟工作為正式社教事業。三十一年將此等人員組成西南、西北、川康等三社教工作隊，深入公路沿線城鎮，以及窮鄉僻壤從事抗戰宣傳及社教工作，使民間明瞭抗戰意義，引起敵愾同仇心理，對於支持抗戰，深有影響。二十七年起教育部組織之巡迴戲劇教育隊共四隊及實驗戲劇教育隊一隊（後改稱實驗劇團）遍歷東南、西南、西北各省重要城市，巡迴上演，觀眾逾千萬人，對於宣傳抗戰及提倡四維八德，現身說法，收效不少。此外，還將原遷後方的國立戲劇學校，改為國立戲劇專科學校，採五年制，收初中畢業生，加以深造。原設山東的省立實驗劇院，也改為國立戲劇學校，訓練正規戲劇人材。

音樂可以深入人心，為社教有力工具，所以我在戰時也竭力提倡。先在部內設音樂教育委員會，從事計畫與研究，繼在重慶青木關創設國立音樂院，在福建創設國立福建音樂專，並恢復上海音專，多方訓練音樂專材。又接辦中華交響樂團，提倡社會音樂。曾先後舉辦陪都千人合唱與白沙萬人合唱，振大漢之天聲，對於激勵民心士氣，不無貢獻。關於音樂學術方面，曾由音樂教育委員會進行編訂音樂詞典，擬訂標準音律，並曾擬訂「中華新韻」，由部請政府公布。

美術教育，在戰時亦多興辦。除中央美術館

與敦煌研究所而外，並成立藝術文物考察團，先後在陝西、河南、甘肅、寧夏等省工作。並在陪都舉行敦煌藝術展覽會。

對一般社會推行科學教育，在戰前山西福建兩省原有科學館的設置。戰時除創設國立科學館外，並督促各省市設置科學館，除施行通俗科學教育外，並對戰時科學設備簡陋的中等學校學生，給予觀察和實驗的機會。各省市先後遵令設置科學館者有川、湘、鄂、贛、黔、桂、康、滇及重慶九省市。

電影與播音為推行社會教育的最有效的工具。我在入教部以前，已經對於教育電影，特別提倡。入部以後對於利用電影與播音施教的所謂電化教育，特別推進。先在社會社會司特增設一科，主管電化教育。並令各省設電化教育輔導處，先後成立者有十八省市。三十一年創設中華教育電影製片廠。又成立電化教育巡迴工作隊，分赴十九省市巡迴示範。截至三十三年十二月底止，共成立五十二隊之多。戰時電化教育器材甚為缺乏，教育部勉籌外匯逐年購發收音機交各省市應用，並在部內設立幻燈製造室，試製植物油幻燈機及電石幻燈機，鏡頭即用國產玻璃，用水力及人工磨製，各完成三十架，可放映玻璃幻燈片。又試製透明幻燈片，印成歷史偉人事蹟一套，用捲筒放映，均已發放無電源的邊遠地區的學校和社會機關應用。這是抗戰期間與環境艱苦奮鬥的一個事例。關於增加電化器材的來源，擴大民衆教育，我曾想向美國請求幫忙贈與小型電影機及幻燈放映機，把這個計畫告知當時設在重慶的美

國新聞處的處長費正清君，託其回美國幫忙。不料這位思想左傾，後來處心積慮幫助共匪要摧毀我們政府的哈佛教授，非但不幫忙，竟在哈佛大學發起所謂倒陳運動，誣指我以統制思想之罪。我知道我這一個向農民施教的大規模文藝運動，是共匪所最害怕的，於是其同路人（至少如此看法）費正清就幫助他們來這一手。後來我離開了教育部，這個計劃也就吹了。這是推行電化教育過程中的一段插曲。

教育部除了直接施行各式各類的社會教育如以上所述的而外，還制頒法規，令各學校兼施社教，並推動各省市推行社教。其中比較重要的如各學校實施社會教育辦法，民衆教育館規程，民衆教育館工作大綱與民衆教育館輔導各地社會教育大綱，省市立科學館規程，體育場規程等等。另外還有二項法律案的完成，一項便是補習學校法，是由教育部所擬經立法院通過公佈的。這補習學校法的要旨，便是各級補習學校列入學制系統之內，和正規的高中以下各級學校並行。另一法律案，便是國民體育法。

教育部爲擴大社教，還制定了各種節日。每年二月十五日爲戲劇節，三月二十九日爲青年節，三月廿五日爲美術節，三月二十六日爲廣播節，六月六日爲工程師節，四月五日爲音樂節，九月九日爲體育節，九月廿八日爲教師節。關於青年節和工程師節的規定的經過，需要特別敘述的。原來在戰前，已經非正式的以五月四日爲青年節。我認爲黃花崗起義比五四運動更能表現青年愛國，犧牲和奮鬥的精神，所以便改以三月廿九

日爲青年節。至於六月六日爲工程師節的來源是這樣的：我記得在教育部任內，被中國工程師學會推爲會長。我對於素所尊敬的顧頡剛先生，曾經作了一件極有意義的事。他是一位極有名的歷史學教授。忽然發了奇想，寫一篇文章說，大禹是個蟲，沒有那麼一個人。他的理由是很欠缺的，但是他的名氣很大，居然有人相信。我聽了非常嘔氣。我想難道離孔子一千幾百年的大禹，孔子對他尚且非常讚美的人，反不及四千年後的顧先生所得的文獻更爲可靠，何況孔子一向重視證據，無可靠的文獻，他不寫作！我於是伺機去找顧先生，請他考據禹的生日是何月何日，以備提出工程師年會拿這一個日子作爲工程師節。他考據了以後，寫了一封信給我，說某年六月六日是大禹的生日。我就根據他的信提出工程師聯合年會，經全體會員一致通過。我隨即宣佈，從是日起大禹不再是個蟲了，因爲蟲的生日是無法知道的，這是顧頡剛先生負責考據出來的，有信爲證。大家皆哄堂大笑，我就救了顧頡剛先生。現在每年六月六日所舉行的工程師節，是這樣來的。

（原文並見自著「從根救起」第六六——六七頁）定孔子誕辰爲教師節也是有意義的，因爲以至聖先師的誕辰爲教師的節日是恰當不過的。最近美國加州從而效法。墨西哥亦繼起採用。甚至美國衆議院已通過同一方案以孔子誕辰九月最後之星期日爲獎勵優良教師之節日，一待參院之通過即可成爲法案。我們創例於先，亦可以自豪矣。

最後我要講戰時關於掃除文盲的成就。我國過去社會教育的最大工作爲推行民衆補習教育，

其實即是掃除文盲。掃除文盲工作在二十九年以前，由社會教育局主管，自卅年度起實施國民教育，民衆補習教育改屬國民教育之成人教育部分。由國民教育司主管。據教育部三十三度統計，後方十九省市共收教成人數爲八百六十七萬二千一百一十五名。加以歷年掃除文盲數爲四千七百三十一萬六千五百四十一名，共掃除文盲五千五百九十八萬八千六百五十五名。此雖距清除文盲之目標尚遠，但已盡相當之努力，而獲有可觀之成效。

十一、邊疆與華僑教育的展開

我國邊疆地區，民族特殊，文化落後，邊疆教育，在戰前已有特殊設施。對日戰事起後，邊疆各省成爲抗戰之重要根據地，教育文化，亟待推進。因而邊疆教育非但未被忽視，且有很大的發展。

邊疆教育方針的確定爲重要成就之一。二十八年全國教育會議通過教育部所提的「推進邊疆教育方案」，以及卅年行政院根據教育部草擬所頒布的「邊地青年教育實施綱領」，乃戰時實施邊疆教育的準繩。「綱領」中確定以「蒙藏及其各地之人民，其語言文化具有特殊性質者」爲實施邊疆教育的範圍，邊疆教育之宗旨則規定爲遵照中華民國教育宗旨，切實推進邊地教育，澈底培養國族意識以求全國文化之統一；並根據邊地人民各別之特殊環境，切實謀其知識之增高，生產技能之增進，生活之改善，體育衛生及國防教育之嚴格訓練。該項「綱領」復明白規定「中

央對邊地青年教育，依一般教育行政系統，仍由教育部主管。「由於此項規定，向由中央政治學校，中央組織部及蒙藏委員會等機構所辦的邊疆學校，均改隸教育部主管。邊疆學校之隸屬，乃歸統一，而教育部亦由此增加了責任。

爲了推廣邊疆教育，教育部不僅接管和維持原有的邊疆學校，還增設了各級的邊疆學校。截至三十二年學年度爲止爲了直接教育邊地學齡兒童，並實驗示範起見，設有國立邊疆小學十七所。戰時不僅有國立中等學校，還有國立小學，這是爲適應需要特殊設施。爲培養邊地師資並貫徹邊教政策起見，我們接辦並創設了國立邊疆師範十二所，內有師範附小十四所，國立邊疆學校和國立海疆學校各一所。另又創辦了國立邊疆中學三所，國立邊疆職業學校九所。教育部直接主管的邊疆學校共計四十三校，學生達五八五八人。（師範附小學生未計入）

爲求邊教推行盡利，教育部復積極推進邊疆考察與研究工作。除零星派員赴察哈爾、綏遠、寧夏、青海、甘肅，及新疆等邊地考察外，並組織了教育部西南邊疆考察團於二十八年至二十九年間在四川、雲南、貴州、及廣西四省邊區考察，對於西南苗夷教育，曾作有價值之建議。民國二十八年後組成有西南、西北、川康、新疆四考察團。民國卅年復舉辦了大學生暑期邊疆服務團，由教育部選派八個大學之教員十人，學生四十七名，前赴四川西部黑水新谷河流域實地調查羌戎邊民，並作教育及醫療之服務。調查部門分邊疆文化，邊疆經濟，邊疆農業，邊疆畜牧，邊疆地

理，邊疆生物及醫藥衛生等七類。其出版的報告書名「川西調查記」。

關於邊疆學術研究，則在中央，西北兩大學增設邊政學系，並補助其他大專學校設置邊疆建設科目及講座。三十三年並曾籌設邊政學院。我去職後，在三十四年改爲國立邊疆文化教育館。

邊疆地方，無論學校教材，民衆讀物，均極缺乏，其原因在於邊地語文特殊，內地所印之教材讀物，不能適用，而邊疆學校又無力自行編印，遂形成書荒。教育部於民國三十二年置辦簡陋邊文印刷機件，譯印初級小學國語常識課本蒙藏回文（與國文對照）各一套（回文本未出全），分發應用。邊地兒童始有適當教科書可讀。同時又將重要邊疆教育法令及三民主義分譯蒙文藏文，印發邊民閱讀。又曾開始編印國蒙國藏辭典及其他補充讀物。

以上所述乃教育部直接主辦邊疆教育，多爲示範及提綱挈領作用。其最後目的，乃在於邊疆教育由邊疆自辦，在這一方面教育部並未忽視。一面補助經費令邊疆各省學校，一面注重督導考核。民國卅二年教育部根據考核結果，曾頒訂「各邊省辦理邊疆教育三年計劃」令滇、寧、青、甘、康、川、滇七省依照規定項目及進度切實推進，曾收相當成效。

華僑爲革命之母，抗戰期間，華僑出錢出力，貢獻很多。海外僑民教育，因戰爭的逐漸擴大，受了很大影響，很多僑校，在當地失去存在，許多華僑青年流離失所。我們主持國內教育，對於僑校的设置與僑校員生的安頓，也負有責任。

因此我在戰時對於僑民教育，也有很多的設施。爲了使華僑教育獲得法令的依據，我在黨的七中全會提議而通過了「僑民教育推進方案」。依此方案我擬訂了「僑民教育實施綱要」提經行政院通過於三十二年由院頒發施行。因爲這兩個文件的訂立，華僑教育的設施便有了根據。

太平洋戰事爆發後，香港及越南僑校，紛紛內遷，計達二十餘所。教育部除撥發經費助其在閩、粵、桂、滇等省分別復課外，對於僑生回國升學的補助及國內僑生經濟中斷的救濟，都不遺餘力。對於僑生有各種救濟金，受助者有一四、二八六人之多。對於僑校教職員之流亡各地者，均資助旅費，協助返國，介紹至國立各僑校任教或介紹其他工作，無一人流離失所。戰時僑校員生的救濟工作，至爲徹底，對於增進海外華僑對於祖國的向心力，很有幫助。

除了對於回歸祖國的僑校師生的安置而外，教育部還在海外增設僑民小學五所，對於海外已立案的僑校並予以經費補助。在國內又因僑生返國的格外增多，必須創設新校收容，自二十九年起先後在雲南保山，四川江津，廣西樂昌分別設立國立華僑中學三所，又在閩粵設僑民師範學校兩所，培養海外僑教師資。又撥款交粵省內各中等學校，增開五十班，收容港澳等地退回祖國的僑生。此外又在復旦大學，中山大學，廣西大學，廣東省立文理學校，由部撥專款各增僑生先修班，收容中學畢業僑生。對於僑生返國考升大專學校者則通令各校從寬錄取；更於國立各大專學校，設置僑生保送名額。戰時對於僑校教師及華僑

青年之安置，可稱無微不至。一方面固然盡了教育行政方面應有的責任，一方面也是酬報華僑的愛國熱忱。此項辦法，在戡亂期間，仍繼續辦理。

僑校教科書係由教育部編輯交書局印行，備各僑校採用。二十八年至卅年間，已將小學各科教科書及教授書全面編輯完成，印發各僑校採用。中學教本自三十年起編輯，至三十一年已編就初中公民、歷史、地理、算術、博物等科教科書供給使用。海外僑校採用部編教科書者達百分之八十以上。此等教科書注重民族精神及祖國實況，足以激發僑胞之愛國情緒。

由於對海外僑校鼓勵立案，在戰時立案僑校激增。對於立案僑校並予經費補助，隨時予以督導。自二十九年超，教育部即會同僑務委員會派專員駐港澳等地，視導僑校。三十年又增派專員至菲律賓、緬甸、印度等地視察當地僑校。

戰時僑教復兼顧僑政人才之培養及南洋情形之研究。三十年起令廈門大學及暨南大學設置馬來語科目，中央大學設置印度語科目。並於三十一年在雲南設立東方語文訓練班及國立東方語文專科學校，藉以培養赴海外僑居之社會及商業人才。三十一年更設置南洋研究所，除研究南洋各地政治、經濟、教育、史地及僑情等問題，擬訂戰後處理方案外，更從事僑校各種教科書之編輯，並進行各項有關問題之研究，提供政府作擬訂僑民政策之參考。

十二、學術研究與國際文化合作的促進

抗戰初起，大專學校遷徙，圖書儀器損失很多。政府外匯短絀，補充不易，加以滇緬路被封鎖，國外物資進口不易。在此情形之下，學術研究，幾於停頓。我到部以後，認為為國家長遠之計，學術研究不可一日中斷，便在無法中設法，使各大專院校加強學術研究。為建立學術標準，有學術審議委員會之設置。為培植研究人才，令各校增設研究所各研究學部。為獎勵學術研究，特設學術獎金。為獎勵自製儀器，補助北平研究院研究製造光學儀器，並創設科學儀器製造廠。為補充圖書儀器設備，特向國外徵求，並向政府請得大量外匯自行購置。這些都是戰時促進學術研究的措施，值得加以敘述的。

關於學術與文化政策的整訂，學術標準的建立，單憑教育行政人員，是不能處理恰當，也不能樹立權威的。我為了尊重學術界的意見，擬建立超乎行政的客觀的學術標準，乃設置了學術審議委員會。這委員會的組織，前邊曾經說過，係由各國立大學校長就學術界選舉十三人，由教育部就學術界聘任十二人，另以教育部次長及高教司長為當然委員組成的。委員絕大多數屬於學術界。部聘的委員亦屬通儒碩學，如吳稚暉、柳詒徵諸先生都是部聘委員。這些部聘委員不單屬於一個學派，在學術審議上具有平衡作用，所以凡是審議會的決定，都能獲得學術界的贊同。因此許多難免爭議的大專學校教員資格審查工作，以及學術獎勵的決定得獎人選，均由於員學術界重望的學術審議會的主持，得以順利進行，而獲得預期的結果。

戰前各大學本有研究院所的设置，係由各大學有適當導師及優良設備之院系研究室發展而成。二十五年年度共有二十二研究所，分三十五學部，研究生共七十五人。戰事發生後，各大學因遷校關係，研究工作，多未能繼續進行。教育部於二十七年撥給經費，就設備與人才較優的國立大學，酌量增設研究所，同時並令舊有研究所恢復招生。至三十三年，大學研究所增至四十九所。各所共設八十七研究學部。研究生共有四百三十二人。比較戰前，數量增加幾倍。依規定，研究生修習專課科目兩年以上，經考試及格，並提出碩士論文經教育部送請專家覆核及格，始可授予碩士學位。學術審議會成立以後，碩士論文之覆核亦歸其主持。研究生之訓練以及學位之授予，都很慎重。

我主張恢復並擴充大學的研究所，其主要目標，因為訓練研究生，其另一附帶目標，也是鼓勵教授從事研究。因為教授要當研究生的導師，自身也就不能不從事研究了。教學相長，在研究院所，尤屬必然。但是指導研究生的教授，究屬少數。我還自卅年起訂立辦法，每年獎勵著作發明及美術作品。在我任內，一共舉行獎勵四次。應徵作品逐次增加，每次均在一百件以上。第一次受到申請獎勵作品經審議會審選予以獎勵者二十九件，第二次申請作品經審議會審選給予獎勵者四十八件，第三次申請作品經審議會審選給予獎勵者五十四件，第四次申請作品經審議會審選給予獎勵者六十六件。得獎人計共近二百人。歷次得獎者如已故陳寅恪教授等，多係學術界知名人士。獎金額亦逐次

提高，自數千元至二萬元不等。對於清苦的教授生活亦不無小補。從應徵者之踴躍，可見此種獎金，對於學術研究有激發作用。宜乎此種獎勵直至今日，教育部猶舉行未替。

戰時科學儀器補充困難。有若干大學教授，往往自行設計製造簡單儀器從事科學研究，也獲得相當結果。此種於無法中設法，不廢研究之艱苦卓絕精神，曾經引起當時英國主持重慶英國大使館的中英科學聯絡處的李約瑟教授 (Professor Joseph Needham) 的注意和贊佩。他曾在英國的科學雜誌「自然」(Nature) 撰文加以報導，文中備述中國大學的學者艱苦研究的情形，尤其對於當時的浙江大學，極為稱道。雖然如此，因陋就簡的儀器，以及過時的圖書雜誌究竟在研究的功用上有制限的，必須有適當的補充。我便在三十一年委託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代製顯微鏡二百架供各校應用，同年成立生物標本製造所。三十一年又成立科學儀器製造所。這些儀器標本勉強可用，仍不能適應精細的研究的要求。我進一步籌款向國外購買圖書儀器。當時政府對美桐油借款成立，我向孔兼財政部長特別請求，承蒙慨撥美金壹百萬元之鉅，供各大學向美購置圖書儀器。均於三十一年底購運到達各校。在國家作戰激烈亟需外匯補充軍用之時，政府能撥如此鉅款，我教育界同仁，同深感奮，益勵教學研究，以報國家。因此在科學人才的訓練方面，成就甚大。回憶及此，我不能不對已經謝世的孔庸之先生再致感佩之忱。關於圖書方面，除了以外匯自購而外，我還向英美友邦募集。英國牛津大學首先

贊助，其後各國人士，均有捐贈。在二十九年至卅年之間，英國募得圖書雜誌六十二箱，內圖書計共三千七百六十九冊，雜誌計共十五種一百四十六冊。在美國亦募得圖書雜誌三百餘箱，均經分配各大學存用。

因為圖書儀器的不斷補充，大學各科教學，能以維持適當水準，研究工作，亦能繼續進行，所以戰時所造就的人才，尤其是科學人才，後來很多人有卓越表現。

關於國際文化合作，我在戰時，也有不少措施，並沒有因為國際交通的困難而中止推進。我特別在部內高等教育司增加第四科，專門主管學生留學及文化交流事務。

在戰爭初起時，因為節省外匯，對於國外留學係取限制政策。二十八年由部規定，無論公自費生均以學習軍工理醫切國防需要者為限。且規定必須大學畢業，且在國內已有兩年研究經驗者方可留學。所以此時除特派派遣之公費生及得有國外獎金或補助金者而外，出國留學人數很少。惟中英庚款留英考試及清華基金留學考試在戰時仍照常舉行，另有林主席七秩壽辰獎學金留學考試，也曾舉行。三十一年英國文化協會贈留英獎學金名額十個，英國工業協會贈免費實習名額十個，又與印度交換留學生名額十名，均經過考試，或甄選優秀學生出國。

戰時限制留學政策行至三十一年，出國人數較戰前銳減。惟三十一年一月，我政府與英美締訂平等新約，國際情勢大為改善，加以抗戰勝利在望，今總統蔣公在其「中國之命運」一書中提

示戰後需才孔亟，須預為培植。教部為配合國策適應時代需要起見，乃放寬留學政策，廢除前述之限制辦法，准許大專畢業生出國，並准結官價外匯，作留學費用。惟其時官價外匯，與實際美匯市價相差懸殊，以官價結匯留學經費留學，事實上幾無異於公費留學。我既與財政部洽商而有此可以官價結匯自費生留學費用之寬大措施，為防止國帑之浪費，對於自費留學生之程度，勢必加以衡定，以免不堪造就者出國。因此而有第一屆留美自費生之留學考試。三十二年舉辦此項考試，與試者七百五十一人，錄取者三百二十七人。三十三年十二月又舉行英美獎學金留學考試，錄取一九五人。錄取學生均因優給外匯，先後出國。現在臺灣服務政府、學校及社會，各部分之領導人材及中堅幹部，一部分即是戰時派赴英美留學學成返國之學生。現在美國以及其他國家的教育、學術，以及工商實業界卓著成績的中國學人，有一部分也是此時派遣出國留學而獲得成就的。其中著名人物，不勝枚舉。舉其著者如楊振寧李政道兩位得諾貝爾獎金，如新任的香港大學校長黃麗松博士，都是戰時由國內出國深造的。數年前我在美國寄居時，我不知道遇見好多的中國學人，向我表示他們戰時出國研究的經過，並向我致謝政府的寬大留學政策的。這也是一種極大的安慰。

戰時我國對外海陸通路，曾一度為敵人封鎖，國際交通僅有空運一途。除了派遣留學生而外，國際文化合作，仍在此交通極度困難情形下，繼續進行。我國與英美印度交換講學研究人員，

往來不絕，皆由教育部主持。英美印度學者包括李約瑟（Joseph Needham）及賴達克里希那（Sarvetalli Radhakrishnan 後來任印度總統）在內，在三十至卅二年之間來華的，有十四人。同期我國學者赴英美印度講學或研究的，包括張其昀、周鴻經、薩本棟等教授在內，亦有二十五人之多。我國教授個人在戰時受外國之聘經教育部協助出國者尚有多人，不在上述人數之內。舉例而言，現在在國際知名為全世界極少數數學家之一的陳省身教授即是在戰時受美國之聘前往研究，無法出國而由教育部特向軍部設法，用軍用機運送美國繼續研究，而成為卓越的數學家的。他最近還敘述此段經過，向當時教育部主辦的人員道謝。

戰時曾由行政院派遣了一個以教育部顧次長為團長高等教育司吳司長為團員之一的赴印文教訪問團。教育部根據訪問團的建議而特別資助印度的設有中國文化講座的「國際大學」並請賴達克里希那來華短期講學。又與印度交換留學生十名。我國赴印的交換生中有特出的人才，如駐澳洲的沈錡大使和現任使職國際問題研究所的吳俊才所長，即是依當時交換計劃被派遣赴印留學而有所成就的。

在戰時，英美各派有人員在我國從事文化合作。英國所派的是前述的李約瑟教授；美國所派的是費正清（John K. Fairbank）夫婦。這兩個人員所負的使命相同，但是所做的工作，對於中國的影響，恰是利害相反。李約瑟教授同情於中國文化。他駐在重慶時曾來見我，談及他之計劃

，擬對於他所最感興趣之中國古代之科學成就，科學思想，及其在人類文化史上的價值，作深刻之研究及比較，並編著成書以問世。余以其所志正獲我心，當即予以鼓勵，並為其介紹有關人士及機構，給予必要之援助。後來李氏在重慶英國大使館的中英科學聯絡處聚集中英科學家，研究考察中國古代科學及戰時中國科學研究的情形，曾遍訪後方各主要學術文化中心。戰爭勝利後李氏復訪北平各大學與中國知識經驗豐富之工匠，討論中國古代器物之製造方法。根據多年研究結果，他寫「中國之科學與文明」，已成鉅著六冊。書中對於中國科學發明之早，對於世界文明供獻之多，發揮盡致。在發揚中國文化，增加中國人之自治心方面，有很大的貢獻。我因為和李氏的研究和著述過去在重慶有此一段淵源，又因為他的這部大著對於中國貢獻很大，所以便發起用中文翻譯他的「中國之科學與文明」而為其主譯人。現在已譯各冊，正在陸續出版中。此書的著譯，起端於戰時的中英文化合作。而李氏的成就就是對於世界與中國文化有極大的貢獻的。

美國當時駐在重慶，從事新聞及文化工作的費正清夫婦的工作，非但對世界與中國文化無益而是有大害的。他們夫婦所做的乃是破壞中國的工作。他們造作蜚語，中傷中國政府人員，供給虛偽情報，引導美國作錯誤政策的決定，以致助長了共匪的勢力，也促成了我政府在大陸的崩潰。他們是共匪的功臣，所以最近曾被邀往中國大陸訪問以示酬德報功。他們在教育文化方面的破

壞，莫過於煽動中國所謂前進分子反對政府以及造謠中傷政府官員。即如我在上文所述的因為我要他代向美國政府捐助電化教育器械，又因為我規定對於留美學生的管理，便誣我要統制思想，並在哈佛大學發動倒陳運動，即是一例。費正清所做的不是文化合作，乃是文化破壞，和李約瑟教授的貢獻恰成一對比。（李氏思想誠然也傾向社會主義。但他並沒有作破壞中國文化的工作，這與費正清是不可相提並論的。）

因為在戰時向政府請得相當鉅量的外匯，我做了一件在戰時似乎不急之務。這便是為了獎勵外國青年研究中國語文歷史與文化，增進對於中國的了解起見，於三十三年在英國牛津、倫敦、美國哈佛、雅魯、密昔根、芝加哥、哥倫比亞、加尼福尼亞及印度加爾各答、國際大學等十個大學，共設獎學金五十名，每名每年金額為美金一千五百元，凡在以上大學肄業的非中國籍學生選習中國的語文、歷史、文學、藝術、政治、經濟、地理等學科一年以上，具有相當成績的，俱可申請，由各該大學核選。後來又擴充名額至美國南加州、華盛頓、史丹福，及英國劍橋等四大學各設五名。此項獎學金直設置至三十七年度，成就了英美兩國的中國學專家不少。其中最著名的，有兩位。一位是吳克教授（Prof. Richard L. Walker），他學成後曾為耶魯大學教授，為一有名的反共學者，曾來臺灣演講，並為客座教授一年。他的反共，極為積極，甚至為耶魯前進分子所不容，而改在其他大學任教。另一位是曾任哥倫比亞大學中國與日本學分主任，大學評議會主

席，現任哥大副校長的狄別瑞教授 (Prof. W. T. De Bary)。狄別瑞教授為在美國漢學研究方面，在費正清所把持的系派而外，別樹一幟的領導人物。哥命比亞與哈佛在漢學研究上成為兩個對壘。狄別瑞教授在哥命比亞領導羣倫，影響最大。他的漢學研究，注重在宋明理學方面，真能把握中國思想的中心，與費正清的只研究中國現代史，暗中為匪張目者不同。狄別瑞教授雖不如吳克教授的公開反共，但是其影響是一樣的。否則費正清在美獨霸漢學研究，其後果將不堪設想了。

吳克與狄別瑞兩位教授的立場，決非出於偶然。我三十多年前，設置外國學生研究中國學問的獎學金，沒有預料能在美國學術思想方面，發生這樣有助的中國的結果。可見但問耕耘，不問收穫，古人之言，不我欺也。關於吳克教授對我國的貢獻，還有一點可以附帶敘述的。即是當大陸失陷，內地許多教授與學生，流亡到香港，設立學校，情形艱苦。最初向美國耶禮協會 (Yale-in-China Association) 建議補助這些流亡學校。後來由該協會決定補助新亞書院而有今日的規模的，便是吳克教授。

十三、青年的救濟招致訓練與徵調

我在以上各段所憶述的戰前的教育設施，似乎主要的是把戰時教育當平時辦，側重於為建國儲備人才，對於抗戰缺少立時的直接貢獻。這種看法，只是皮相，實際上教育應該「平時應有戰時的準備，戰時應如平時的鎮定」，所以戰時正

規育教是抗戰與建國雙管齊下的，對於抗戰的需要，從未忽視。除了正規教育中已寓有輔助抗戰的目標而外，在戰時我們還對於抗戰有當下直接的貢獻。在這一方面，我們是以戰區、敵後，以及後方的全體青年為對象。在戰時沒有設置青年部，青年部乃是戰後才設置的。我們教育部在當時兼做了青年部的事。所有招致、救濟、訓練和徵調工作，都是教育部負責辦理的。

戰時的青年工作，第一件最緊急的事，便是爭取青年。此一措施具有兩大意義：(一)大凡子女之能入中學或大學者，其家庭多半為中上之家，吾人若在後方照料其子女之學業，其父兄決不為日偽所利用，甘為漢奸。(二)奔赴自由區之學生青年，深信政府必能為之設法，若來而無人照顧，勢必為共匪所勾引，欲求補救，將不及矣。故雖化費大量國帑，亦屬值得。以上是我向行政院力爭採取貸金制度之最大理由。蓋當時我們非但要在敵後和戰區向敵偽爭取，還要同時向共匪爭取。當時共匪利用抗日機會來吸收青年安置於所謂抗日大學，以共產主義，毒化青年，希達政治企圖。在敵偽地區，暗中打着一致抗日旗號招致青年，青年不知實情受誘致者不少。我方為拯救青年免被共黨利用，一方為充實兵源及保存國家元氣，乃用種種方法向敵後戰區，大量爭取青年。一面在敵偽控制區域，依「淪陷區教育設施方案」就地在地下設校吸收青年予以抗日教育，並分區派戰區教育督導專員主持其事。由二十七年之五十個督導區增至三十二年之一百零二區督導區。此等督導專員及地下教育工作人員冒險犯難，

精神可佩。據戰後不完全的調查，殉難人員有四三人之多。

淪陷區青年如無法就地教育，則在各地設站招致運送後方安置。最初係零星招致。三十年教育部成立戰地失學失業青年招致訓練委員會，作大規模有計畫的招致與訓練。自廿九年起至卅二年止招致青年計達十五萬四千八百九十六人之多。

對於招致至後方青年之救濟與訓練有種種適應需要之措施。此等青年，離鄉背井，無人接濟生活，其衣食住所均由教育部撥款供給。除少數就業者而外，此等青年均先後安置於學校繼續受教。其中中等教育程度之學生則設立各種國立中等學校，及臨時中學予以收容。其中原在大專學校肄業之學生則分發大專學校借讀。此種借讀辦法，乃是戰時所首創。凡戰區甚至港澳大專學校學生一律分發學校插入相銜接之科系班級。極大多數均在借讀學校完成學業。原在戰區大專學校學生，聞有借讀辦法，雖不經招致，亦源源而來。戰時大專學校學生人數之增加，借讀生為其來源之一。分發借讀學生，不僅以我國之公私立大專為限，即香港大學之中國學生，也一例分發借讀，甚至港大教授也隨同借讀學生在借讀學校任教。據前在港大醫學院任教授，戰時率港大學生在我後方借讀，其本人並同時在重慶之上海醫學院任教之王國棟博士 (Dr. Golden King) 親告現在港之前高教司吳司長，港大戰時在我後方借讀學生有數百人之多。王博士對於我方之一視同仁樂育為懷，至今猶表示感謝，並稱正對此事

寫紀錄以作久遠紀念云。香港現在政治與社會中不乏知名人士，係戰時由教育部分發後方借讀者。例如現任香港政府醫務衛生處長之蔡永業醫生，現任香港市議會及立法局議員之胡文瀚議員，現任香港大學醫學院外科主任之王美源教授，均是戰時在後方借讀完成學業者。所可憾者，我方對香港大學一視同仁，而香港政府並不念戰時友誼，也不考慮我國大學之水準，對於我國大學畢業學生在港服務者，並未承認其同等資格。尤可憾者昔日曾在我國大學醫學院借讀之港大醫科學生，對於我國醫科畢業生在港希望開業者非但不予以同情援助，反加以阻撓，以怨報德，殊示人以不廣也。

戰時對於救濟青年一事，由於政府負擔太重，教部所面臨之困難最大，戰區學生大量湧至後方，衣食住學樣樣刻不及待，當時救濟費用用資金名義，蓋欲使財政當局易於同意，將來有收回之望耳。蓋來自戰區之中等以上學校學生，離鄉背井，多係經濟來源斷絕，如不予接濟，非但不能繼續學業，且不能維持生存。我當時即感覺對於這班學生不但要教，還要養。因而負起責任，設置貸金制，使這些經濟來源斷絕的學生，可以貸金維持生活。貸金包括膳食及衣服各項費用。最初名曰貸金，原期受貸學生將來就業後償還。後來因負債不易辦到，並且法幣貶值，即令能償還，亦幾乎等於不還，所以將貸金改為公費。後來非戰區學生，因家庭不勝負擔，也幾乎都得了貸金或公費。此項支出費用浩大，幾乎超全體教育文化經費二分之一。對於此等學生真是教養兼

施，而國庫負擔之重，也於此可見。費用雖大，但是成就甚衆，據統計戰時由中學以至大專學校畢業全賴國家貸金或公費以完成學業者，共達十二萬八千餘人之多。此等皆是國家不可少之人才。凡是現在國內外五十歲左右之社會中堅分子，幾無人未受貸金或公費之惠。如無貸金及公費制度，不知道有多人失學，將為國家一大損失。這種制度所以值得大書特書者在此。現在美國亦仿效我們對於大專清寒學生建立貸金制度矣。

以上敘述了戰區青年的招致和救濟與安置，最後要說對於青年的軍事徵調。原來在戰事將起初起時，不但有人主張將一切教育改為戰時教育，還有人主張將及齡的大專學校青年一律照壯丁抽籤辦法徵召入伍。我當時認為青年志願征軍，應加鼓勵，但大專學生一律抽籤入伍一節，須慎重考慮。我國與歐美日本國家不同。一則它們的兵源少不得不管青年知識程度，而對一切壯丁作無分別的抽調入伍。二則它們的教育發達，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數比較多。至於我國則兵源衆多而受大專教育的人數太少，當時全國只有四萬人，即人口一萬人中受大專教育者不及一人，為了國家建設前途，也為了儲備作對軍事更有價值的貢獻，不應無分別的與一般壯丁一同抽調入伍，應該仍令受大專教育而加以軍事訓練，遇將來必要時，再行徵調。我這種意見，幸獲軍事當局的贊同。雖然當時有人反對，可是這種緩召政策的正確。即以美國而論，在第二次大戰時，不是對醫學生緩徵麼？這次對越南戰事，不是先對所有大學生，後來對大學研究生緩徵麼？保全人才，

作戰時和平時最適當的使用，乃是正確的徵調政策。

政策既定，我便於二十七年發出告全國青年書，指出日寇之所以侵略我國者，由於我國科學與工業落後，我們自不能因抗戰而將學校停頓，致使差距更大，並聲明四點：第一、青年願意從事軍事工作者，教部負責送往軍事工作地點；第二、其自己認為不適合軍事工作者，教部當送往學校讀書；第三、無論在何級學校肄業之青年，遇國家有需要時，應隨時放棄書本，以應國家徵調。第四、政府決不容許任何青年，既不從軍，又不入學，假抗戰之名，行逃學之實，以為害國家社會。

我後來對於青年的處理，就是依着上述四個要點進行的。二十七年政府在武漢時，志願參加抗戰工作的青年，由教育部保送入政治部戰時工作幹部訓練團受訓，期滿分發前後方擔任各項戰時工作者，共四百八十人。戰時各種軍事學校學生名額大量擴充，經保送及自動報名應考者，均為中等以上學校在校生或畢業生。後來由前方招考來後方的失學或失業青年，除分發入學或介紹就業者而外，也是軍校入伍生的來源。

抗戰數年後，軍事日漸緊急，前方需要知識青年從軍，協助軍事工作，我因協同有關部門徵調專科以上學校學生從事軍中工作。首先徵調的是醫科學生。在抗戰初期，已有一部分醫科學生在軍事醫院及紅十字會救護機關服務。自二十八年七月起正式開始徵調醫藥科學生服務。所有醫藥科應屆畢業生，全數受徵調在軍事醫院及國家

醫務衛生機構服務。自卅年起准以應屆畢業生全數百分之十五至二十留校服務，其餘則分別由軍醫署及衛生署分配工作。其次徵調的是工科學生。三十年一月四川江西兩省建築軍用機場。教育部徵調大學工科四年級學生前往工作。三十年由部訂定徵用工程學科畢業生辦法。徵用名額，以各級工程學科畢業生總名額百分之十為度，自三十二年開始徵調。戰時徵調服務人數最多的是翻譯人員。三十年秋先徵調各大學外國語文學系三、四、五年級學生，經在戰地服務團受訓後，派任美國來華志願空軍的譯員。三十三年教育部復奉令將重慶、成都、昆明、貴陽等區各專科以上學校高年級男女全體徵調為軍事譯員。總計抗戰時期徵調任譯員之學生共三二六七人；經徵調任醫藥工程等項工作之學生共三一〇四人，總計為六三七一。其在校學生自動參加軍佐工作或譯員工作者尚不在內。受徵學員，都是踴躍應徵，不避艱險，完成任務，沒有一個臨徵而規避的。

最壯闊的青年參加軍事工作運動，要算是自卅一年起由教育部發動的青年從軍運動。當時戰事格外劇烈，單是徵用各校學生任軍事技術工作已不能完全適應需要。為鼓勵士氣，及充裕兵源，當時更需要知識青年受訓入伍，正式加入作戰行列。在學學生原在免徵之列，此時情勢緊急，不得不發動在學學生志願從軍。經過發動以後，各地志願從軍學生風起雲湧，蔚成風氣。截至三十二年止，各地從軍青年已達一萬五千餘人。三十三年多教育部更發動波瀾壯闊之十萬青年從軍運動，為教育史及抗戰史上留下光輝燦爛的一頁。

。教育部為鼓勵在學青年從軍，曾訂下種種優待辦法。各大學學生投筆從戎，爭先恐後，社會動容，軍隊振奮。使全國抗戰精神更加發揚輝煌。雖然由從軍之青年經過編組訓練而成之青年軍，開赴前方作戰，歷時未久，即告抗戰勝利，但青年愛國犧牲以及鼓舞士氣之精神是極可稱道的。從以上的敘述，可見戰時教育，不但為未來建國儲備人才，同時對於支援抗戰，也已盡了最大的努力。

十四、回憶後的感想

上文是我回憶戰時主持全國教育行政的經過，信筆寫來，不覺連篇累牘。就回憶所及，我在戰七年中對於教育確做了不少的事。當國家從事戰爭，危急存亡未卜之時，戰區員生數十萬人，流亡在途，亟需安置，各級各類教育事業，俱待舉辦，為建國與抗戰作積極準備；又當戰時物力財力萬分困難，而能做出這些事，現在想來，真不知當時何以可能。回憶經過，以為有幾點可以解說。第一、由於最高當局對於戰時國策的英明決定，使抗戰與建國兩管齊下，而教育決策也得有依據。第二、由於當時賢明的財政當局深知教育的重要，力排眾議，寬籌教育經費，使我在教育行政方面有所施展。第三、由於我選擇了努力奉公的工作幹部，在行政方面能貫徹教育政策。第四、由於戰時各級教育人員以及青年學生，都能深體時艱，各盡本職。雖然在萬分清苦的生活中，仍各無怨言，並且格外踴躍奮發，使教育得以順利進行。我個人雖主持全局，仍賴上下左

右的領導與合作，始能有所成就。我個人若有一點貢獻，即是我的革命精神。我負了黨國付託之重，本著革命精神，認為應該做的工作，即集中精神，不畏艱難，不避險阻，奮鬥犧牲，說到做到。有錢也做，無錢也做。該做的即做，做了再說。先求其有，再求其好。我憑此精神，根據我對於教育的整套主張，按部就班的做去，孜孜兀兀，鋌而不捨，才有上述的小小成就。

我現在回憶已往的工作，千頭萬緒，正如一套活動電影，一幕一幕的映現在我目前，撫今追昔，不禁感慨萬千。有許多當時合作的人，或已於戰時奮鬥力竭而去世，或已於戰後完成其工作而脫離塵世，有許多人陷在大陸，或已受迫害而失去生命，或正在苦難中。戰時所保全和造就的人才，或正在陷區被迫奴役，或流離他國，楚才晉用。有許多戰時維持或開創的教育事業，或已停歇，或仍然存在而精神與面目全非。這些都是使我因回憶已往而不勝感傷的。

可是我回憶已往而感覺欣慰的，也有不少事端。首先是戰時教育確為抗戰與建國克盡了雙重的責任。為了抗戰，訓練了好多萬的青年支援軍事；為了建國，保全了以及培養了許多專才。所可惜的是大部人才，因為大局的變化，一部分為敵所用，一部分用於別國。中共現正以原子彈威脅世界。他們製造原子彈的專門人才，那一個不是我們在戰時所保全所幫助深造，或是在戰時大學所培育的？至於現在美國學術教育，工商各界的中國專家學者人數在五千以上，大多數也是我國戰時大學或中學所保全所培育的人才。所可惜

者此等專才一時尚未能為我所用以促成建國大業。不過在今日臺灣，所有各界的少數領導人才及多數中堅分子，都是戰時所培育出的人才。憑他們的努力而有今日富庶康樂的復國基地。當年國家辛苦保全和栽培人才，以有今日成效，是值得欣慰之事。

我所感到最驕傲的一件事，是自由區全體師生，沒有一個人向我要求過對於他們的伙食費予以增加，我幾乎走遍了前後方各省巡視了極大部分本部主管的大中學校，親眼看到他們吃的僅是青菜豆腐，米飯更是質料很差，但是個個精神愉快，對抗戰前途，個個抱樂觀信心，使我十分感動，我有時和他們共餐，和他們閑談，他們對我的講演，並不認為向他們打氣，而是認為中央的看法和他們完全一致，吃苦是應該的，勝利必須從上下一德一心同甘共苦中得來，我從吾國青年的意志和理智中，確信吾國的前途十分光明的。

其次，我在戰時為臨時及久遠着想而創立的若干教育制度，經過了二三十年，現在還繼續在臺灣施行。例如大學聯合考試制度，大學訓練制度，學術獎勵辦法，大學教員審定辦法，大學先修班制度，五年一貫的專科學校制度，中小學國定教科書編印辦法，自費留學考試辦法以及中國醫藥研究所制度等等，都是經過時間的考驗，而證明其確屬適應需要而能繼續存在的。

回憶在戰時的教育措施，由於各級教育校數及教員學生數的增加，社教及邊疆與華僑教育的展開，在當時曾有一種批評，認為發展太快，因有太多和太濫的現象。這種批評，在當時我已加

以辯答。此時從教育的結果來衡量，更外見到這種批評，不符事實。所謂太多或太少，應根據需要而言。如符合需要，即使有更多的擴充，不得謂太多；如其不合需要，即是只辦一所學校，也不得謂之太少。現在回顧在戰時所辦教育事業，沒有一件不是為適應當時，或久遠的需要而與辦的。幾十萬的員生流離失所，不得不與辦學校加以安頓。戰時需要許多技術專材，不能不增校增班加以訓練。要喚起全民對日抗戰，社會教育不能不創造新局面。為了安定邊疆，以及為了照顧在海外失學返回祖國的僑生，不能不擴充邊疆及僑民教育。為了對於本國固有知識從根救起，對西方科學技藝迎頭趕上，不能不加強學術研究。為了預儲建國專才，不能不開放國外留學。這許多事業，對於教育各種方面，幾乎全面顧到。從表面看來不免有大大小小，多多益善之嫌，但是細加考核，無一件不是為適應需要而興辦的。非但不能說太多，現在看來，還有許多應做未做之事，回憶之餘，不免慨然若失！

每種事業的質與量，有時是相對待而成反比的。戰時教育的數量發展得很快，尤其在物力萬分艱難的戰時，率羅補屋，因簡就陋，由多而一「濫」，在初辦時確屬難免。但是我做事所探的方法，乃是先求其有，再求其好。古人也說凡事作始也簡，將畢也鉅。如其初時不肯因簡就陋，勢將一事無成。可是各事雖從簡陋開始，除了求有而外，我還在求好方面，多加努力。如對於課程教材的改進，如對於師資的培養和審定，如對於學術研究的獎勵，如對於科學儀器的製造，如請

得鉅額外匯對於國外圖書儀器的購備，如對於各級學校教科書，用書，或參考書的編印，如對於大學教授與學者出國進修儘量予以協助，在提高教育的素質上也盡了應盡的努力。其結果是各級教育的水準，並未降低。所造就的人才，還有些在國內外有卓越的表現。單就大學教育而論，以戰時物人力量的艱難，既維持又有擴充，最易於降低水準。可是事實不然，有一具體事例可以證明。在戰時培育成就的大學畢業生（大部分是由戰時中學畢業升入大學而畢業的）先後數百人應英美留學考試出國，在國外均能直接入研究院任職者固多成就，其留在美國工作的，成為有名的教授、研究員、工程師、醫生、工商企業家者為數很多，我國駐美大使館文化參事處有名冊可稽。由此實例，可以證明我國戰時的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水準並未降低，其畢業生且有卓越表現。戰時教育太濫之說，可不攻而自破。

最後還有一點感想：我獻身黨國數十年，于黨政工作，多所參與。成敗得失，有待公評，惟在戰時這一段教育行政工作，雖然未必能達到理想，總算對於國家，竭盡棉薄。我總覺得百年樹人的教育文化工作乃是最有積極意義的工作，而教育文化事業的興辦，乃是最有收穫的長遠的「投資」。現在我雖已滿頭白髮，脫離崗位，但仍將以有生之年，為文化事業，賈其餘勇，再盡一部分的責任。